

道部部长、党组书记。面对郑州、兰州等铁路局和贵阳、蚌埠等铁路分局运输的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他果断整顿和建设工地，提出了迅速扭转铁路运输被动局面的目标和要求，加强铁道部对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指挥，整顿运输秩序，实现了京广线全线畅通,较好地解决了“晋煤外运”问题,为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保证和推动作用。

1978年10月，段君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坚持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解决了河南省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他针对河南省的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积极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将农村的承包经验运用到工业企业，积极在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工作，调动了企业职工和农民的积极性。他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注意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和有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认真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突击提拔干部、突击发展党员的问题，为加强河南省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81年1月至1984年5月，段君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首都建设的指示精神，围绕政治思想建设、环境美化建设、科学文化建设、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建设，狠抓落实，主持制订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加快了首都市政建设速度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工农业总产值以及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全市广泛开展“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大讨论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活动，强化首都服务观念，大力规范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推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把首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大事来抓，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为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强保证。

段君毅是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南地区工商业进行调整。他还参与领导了成渝铁路的建设工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2年8月，段君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分管基本建设和干部工作。他重视人才和科技工作在推动机械工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及时从全国抽调一批干部，组建和充实部机关及直属单位的领导班子。先后

组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大连俄语专科学校、上海造船学院、北京机械学院等70多所大中专院校，还组建了电器科学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院等一批科研机构。他领导和指挥了第一重型机器厂、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厂等一批对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骨干企业的建设，亲自参与规划、选址、建厂、投产的各个环节，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1960年9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遵循完善体系和自行设计的指导思想，主持制订了部党组关于机械工业调整工作规划和工作意见。从大局出发，坚决关、停、并、转了一批生产长线产品的企业，保护了骨干企业的生产力，大力加强企业技术管理和发展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发展精密、大型、特殊装备，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机械工业技术，使新中国机械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门类比较齐全的机械制造工业体系，为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段君毅受到冲击和迫害，他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1970年8月后，历任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会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为四川省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三线”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以后，段君毅任铁

## 段君毅

封锁；在敌后建立游击根据地，和日伪军进行有力的斗争，参与指挥了陆房、苏村和菏泽等战斗，身负重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0月，段君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组织部队投入回击国民党进犯晋东南解放区的战斗，取得了河北武安峭河、山西白（圭）晋（城）、河南安（阳）北作战的胜利。1946年4月后，任冀鲁豫行署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战勤总指挥部司令员，组织民兵、民工参战，筹集供应粮秣，组织运输队、担架队运送弹药、给养，转送伤员和清扫战场，为野战军作战提供了战勤保障。同时，认真总结陇海、定陶、巨野、鄆南等重大战役战勤工作经验，主持制订《冀鲁豫区参战支前条例》等条例条令，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期支援前线提供有力保证。根据中央指示，他还参与了由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国共两党的“黄河归故”谈判。谈判中他坚持原则，迫使国民党接受我党的部分意见，达成《菏泽协议》《上海协议》。在国民党违背协议的情况下，他及时组织冀鲁豫边区20万民工进行浚河复堤，抓紧抢修和整治故道堤坝，避免了解放区数百万人民在黄河重归故道时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

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后，段君毅任中共鄂豫区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参与开创大别山解放区的斗争。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采取因地制宜、上下配合、群策群力等有效措施，积极筹备渡江作战所需的船只和军需，保证“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为完成“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段君毅先后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市财经接管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他坚持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工作的重点，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对西

互通情报，传递信件，联络抗战力量，开展抗日活动。宋乐三制订了联络暗语，把一座座伪岗楼叫作高粱一斗，把几个鬼子叫作几个丸子，把100名日伪军叫作豆子百斤，把50支枪叫作50根高粱秆，并把烟卷、花生壳作为传递密件的用品，确保联络工作万无一失。他还要要求各级抗日干部在工作中用化名，并规定了严密的接头方法，使濮东工委的各项工作在日伪军眼皮底下顺利开展起来。

农历三月初八，是八公桥镇集日，大街上人人往，熙熙攘攘，好生热闹。宋乐三从镇上查看回来，边走边想：何不趁着这个时候混进日伪军驻地侦察一番，以便寻找战机让区游击队打个漂亮仗！于是，他找到中共八公桥镇总支书记靳志海的儿子靳秋贤，对他说：“秋贤，请你找几个小伙伴儿，咱们一块儿到日本人的兵营里玩一回。听说那里有很多炮弹壳呢，拾回来卖钱能买好多好吃的，你好好不好？”“好哇！好哇！”靳秋贤一听就高兴地跳起来拍巴掌，过一会儿又眨巴一下眼睛说，“不中，不中。小孩儿能去呀，你是大人，又是外地人，鬼子问你不是八路，你咋办？”宋乐三说：“不要紧，我的个子低，和你一样高，穿的一样破，鬼子不会盘问的。万一鬼子问你，你就说是你小表叔，来赶集串亲戚，不就混过去了？中不中？要不，我就去找别人啦。”靳秋贤听他说得有理，就点头答应了。

不一会儿，靳秋贤找来5个小男孩，领着宋乐三这个“大男孩”欢蹦乱跳地到兵营玩去了。孩子们在宋乐三指挥下在日伪军兵营里东跑西窜捉迷藏，一会儿拾弹壳，一会儿捡罐头盒，一会儿钻进伙房里要吃的，一会儿爬到窗户上看看罕，不到半晌工夫，就把日伪军情况搞了个明白，得胜而归。靳志海事后批评他：“短宋(同

在这紧要关头，宋乐三来到了八公桥。面对险恶的抗日环境和区干部情绪日渐低落的状况，他一到任就召开了区干部会议，积极开展工作。他逐段逐句地向干部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结合濮东区的实际，分析坚持抗日斗争的有利因素和困难条件，提出有理有据的新观点。

会议结束后，宋乐三就带领干部到各个村庄，联络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恢复重建抗日组织，使全区的抗战斗争日益活跃起来。

过了春节，日伪军又在濮东一带接二连三地实行“强化治安”，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和抗日群众，使趋于好转的革命形势又急转直下，八公桥一带的抗日组织又遭受严重挫折。

宋乐三审时度势，及时转变斗争策略，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抗日斗争。除了在八公桥镇上建立地下联络站，他带头拿出每月津贴3元钱，区干部也纷纷拿出三毛五毛的积蓄，筹集了在镇上开一家丸子汤小店的经费。

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小店顺利开张。“哎！丸子汤，丸子汤，便宜又快当，喝上一碗喷喷儿香！”扮作店主的中共党员的叫卖声，吸引了不少客人。方圆几个村抗日组织的联络员从四面八方来到店里喝丸子汤，

## 人

段君毅1910年3月13日出生于山东省濮县(今河南省范县)。早在山东聊城省立第二中学读书，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31年初中毕业后即赴北平求学，同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2年夏,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和土地问题研究会等进步组织，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抗日救国思想，先后参加了北平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和“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中国大学支部书记、北平市西区委委书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同年10月赴上海,任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执行主席，并负责编辑出版全国学联机关刊物《学生之路》，领导学生运动。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反动政权以所谓“危害民国罪”逮捕沈钧儒等7人的“七君子事件”发生后,他带领全国学联同全国各界一起，支援宋庆龄等人发起的营救运动，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作坚决的斗争。

1937年12月，段君毅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被派往山东抗日前线,任中共泰西特委书记、泰西行政委员会主任，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开辟泰西抗日根据地。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调整加强了地区自卫团领导班子，并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组织建立了泰安、肥城、长清、平(阴)阿(城)、汶(上)宁(阳)等县的县委，以及部分区委和乡、村党支部；建立了中共领导的6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在泰西地区建立了动委会、自卫队、农民协会、工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完成了整军、建党、建政的任务,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9年8月后,段君毅先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旅副旅长，鲁西军区副司令员,鲁西行署副主任、主任,冀鲁豫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共冀鲁豫第二、第八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豫东(水东)工委书记,冀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政治委员。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他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主持制订了《整理田赋地亩暂行办法草案》，努力保护农民利益和抗战积极性；组织建立生产、消费、信用合作社,开办小型民用工厂,积极发展公私贸易,扶持农副业生产,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经济

封锁；在敌后建立游击根据地，和日伪军进行有力的斗争，参与指挥了陆房、苏村和菏泽等战斗，身负重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乐三，原名玉家，又名宝善，1918年6月4日出生于河南省南乐县宋谷金楼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懂事勤快，爱说爱笑，是个大人小孩都喜欢的宝贝蛋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一边上学，一边到中共地下组织举办的农民夜校参加抗日活动。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毅然离开新婚仅3日的妻子，步行百余公里到抗战前线，在中共直南特委主办的抗日救国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投身抗日救国斗争。次年冬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中共冀鲁豫区委任命宋乐三为濮东工委书记。

位于黄河以北、濮阳县东南的八公桥镇，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侵略军和伪军派重兵驻扎在八公桥,中共濮东工委和区政府也秘密设在这里。由于日伪军反复“扫荡”和汉奸特务的捣乱,濮东区的中共组织和抗日力量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异常严峻。

在这紧要关头，宋乐三来到了八公桥。面对险恶的抗日环境和区干部情绪日渐低落的状况，他一到任就召开了区干部会议，积极开展工作。他逐段逐句地向干部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结合濮东区的实际，分析坚持抗日斗争的有利因素和困难条件，提出有理有据的新观点。

会议结束后，宋乐三就带领干部到各个村庄，联络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恢复重建抗日组织，使全区的抗战斗争日益活跃起来。

过了春节，日伪军又在濮东一带接二连三地实行“强化治安”，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和抗日群众，使趋于好转的革命形势又急转直下，八公桥一带的抗日组织又遭受严重挫折。

宋乐三审时度势，及时转变斗争策略，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开展抗日斗争。除了在八公桥镇上建立地下联络站，他带头拿出每月津贴3元钱，区干部也纷纷拿出三毛五毛的积蓄，筹集了在镇上开一家丸子汤小店的经费。

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小店顺利开张。“哎！丸子汤，丸子汤，便宜又快当，喝上一碗喷喷儿香！”扮作店主的中共党员的叫卖声，吸引了不少客人。方圆几个村抗日组织的联络员从四面八方来到店里喝丸子汤，

民夜校,组织工人、农民学习文化,接受革命教育。年底,烟台已有共产党员100余人,党支部、小组遍布于工厂、学校、机关和医院。1930年2月，烟台市工人罢工,举行游行示威,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斗争失败。但这次斗争时间长、范围广、影响深,为烟台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蒋介石对烟台的形势惊恐不安,密电刘珍年，指责他包庇共产党,命令他必须即时严禁党,否则必予严惩。鉴于形势逆转，争取刘珍年已失去价值,按照中央指示,1930年3月，李素若等撤离烟台。

部分未暴露的党员组成中共烟台市临时委员会，潜伏在烟台坚持斗争。

离开烟台后，李素若到北平，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工作，参加了北平“八一”示威。此后形势严峻，在白色恐怖之下，他颠沛流离，利用各种关系做过陕西省参议、西安高中教育主任、徐州一家私立中学的教员、北平商学院教员，北平《通俗读物》编辑社编辑，既是为了谋生，也尽其所能做些革命工作。“七七事变”后，李素若再次回到家乡濮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1937年7月底，他同平杰三、晁哲甫、赵纪彬、王照临、高镇五、王振华等在南乐、清丰、濮阳、大名等县成立了冀南文化界救国会。刘大风受命回直南组建抗日武装，李素若同王振华做通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工作，张荫梧委任刘大风为大名、濮阳两专区民运指导员，为刘大风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0月，中共直南特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四支队成立，李素若任联络员，负责部队的对外联络工作。他利用各种关系，从西安、武汉等地搞来军需品、宣传品，还为四支队募捐了部分经费。四支队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是他募捐来的。他还将家里卖地的钱交给四支队，可以想象这对于刚刚建立、无经济来源的四支队来说何其宝贵！对于部队的发展，李素若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四支队可以与丁白联合，但不能跟丁搞在一起，而应独立活动，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建立自己的政权。李素若的这些建议，现在看来无疑十分正确，而且是在太重要了。但在当时，直南特委的主要负责人却不认同这一观点，反而对李素若产生怀疑，怀疑他想破坏统一战线。

一封从西安寄来的信坚定了这种怀疑。这封信收信人是李素若、王冠儒、李茂林，寄信人署名汪静涵，信上写的是问候和鼓励。直南特委主要负责人认定汪静涵就是托派张慕陶的化名。这封信就是托派指示信，李素若等三人都是托派。其实，汪静涵是中共早期党员，与李素若等人是老相识，李素若不久前到西安为四支队募捐，汪静涵给予很大帮助，现在来信问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直南特委主要负责人不做深入调查，即武断地作出了对三人进行镇压的决定。1938年4月1日（农历三月初一），李素若带着一笔从老家募捐来的钱，兴致勃勃地来到四支队驻地范县王辛店。没想到立即遭到拘捕，募捐来的钱也被说成是用来收买四支队的。就这样，李素若被不明不白地拉到王辛店村北头王家坟地里活活刀砍死了，年仅33岁。此前，王冠儒已被秘密枪决。李茂林得讯后逃离，才幸免一死。更不幸的是，李素若的三弟李道源(字清泉，又名晓初，中共党员)在吕正操担任政治部主任，也受李素若案株连而被枉杀。

李素若案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纠正。1983年9月，中共濮阳县委作出《关于李素若同志被错杀的平反决定》：“李素若同志是位好同志，对革命是有贡献的，定他为托派是无根据的，轻率处死是错误的，确属一起冤案。经县委决定，为李素若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推翻不实之词，消除政治影响，做好善后工作。”

## 濮陽日報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纪念在新中国成立和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濮阳人，激发濮阳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濮阳提供更加强劲的内生动力，市委宣传部、濮阳日报社、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公室决定联合编撰《杰出濮阳人》一书。历经公开征集、推荐遴选、专家评审、会议审定等多个环节，最终确定77人入选。他们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濮阳籍或长期在濮阳工作生活的杰出人物，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先辈先烈和先贤，有和平年代和建设时期的全国道德模范和时代楷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作出重大贡献的各行各业杰出代表。在该书出版之前，我们征得编委会的同意，即日起开辟专版先行刊登，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李素若是濮阳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原名道远，号自重，1905年出生于濮阳县李道期村。幼年就读本村私塾，1920年考取濮阳高小，1922年考入大名省立十一中学，次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随后，他到北京求学，考入私立大同中学，开始接触《向导》《先驱》等进步刊物，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25年，他转入北京法政大学预科班读书，由同乡、北京俄文法专学生王亦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发展平杰三、王守真等人党。1927年3月，中共党员、大名七师学生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到北京寻找上级党组织，李素若帮助他们和中共北方区委取得联系。不久，中共北方区委派李素若去大名，任中共大名特支书记，以大名七师教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在中共大名特支的领导下，大名党组织发展迅速，尤其是大名七师，包括校长谢台臣、教务主任晁哲甫、训育主任王振华在内的大批教员和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大名七师成为直南革命的一个重要策源地。

5月，大名“红枪会”暴动，七师被迫放假，李素若回到家乡濮阳。不久，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三军梁寿凯部占领濮阳。借助高涨的革命形势，李素若和赵纪彬、李大山等在濮阳建立了中共濮阳特别支部，李素若任书记。为了便于工作，李素若又以国民党员身份在濮阳设立国民党县党部，并自任书记长，帮助北伐军筹饷。各部部长如李步庭、赵纪彬、谢台臣、王亦华都是跨党党员。濮阳特支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公开活动，使濮阳没有出现大革命失败后大量共产党员被捕杀的局面。10月，中共濮阳县委成立。在中共濮阳县委领导下，濮阳县千口、化村、井店一带的农民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1929年2月15日，县委在温那固召开庆祝算账斗争胜利大会。地主豪绅勾结濮(阳)、内(黄)、滑(县)地主民团武装，对大会进行突然袭击，打死3名农会会员，拘捕县委领导员赵纪彬、李大山、刘汉生、王卓如。温那固事件发生后，李素若即以国民党濮阳县党部的名义联合大名、清丰县党部一起出面，想尽办法营救被捕人员。结果刘汉生、王卓如“取保外押”，赵纪彬、李大山被轻判两年半徒刑。后来，河北省政府再查此事，封了国民党濮阳县党部，以有共产党嫌疑下令通缉李素若。

为了保护李素若，中共顺直省委将他派往烟台，通过关系安插到地方军阀刘珍年的训政处。不久，李素若升任处长。李素若帮助刘珍年办学校，训练军队，借机进行革命宣传，发展党的组织。他还专门做刘珍年的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革命道理，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可以在一些问题上左右刘的态度。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指示烟台地下党组织设立军事、地方、警察三个特别支部。因为李素若等的工作卓有成效，军事特支率先建立起来，由刘珍年部军官及学生中的秘密党员20余人组成，李素若任书记。李素若又积极联络打入烟台公安局内部的秘密党员，协助建立了警察特支。不久，地方特支也建立起来。三个特支贯彻周恩来的指示，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军事特支的工作十分活跃，和地方特支共同创办了《胶东日报》(后改为《胶东新闻》)，刊登国内外新闻、工农红军作战胜利的消息及全国各地工运、农运、学运的动态等，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混战的革命宣传。虽然该报创刊3个月即被当局强令停刊，但它发行量达到6000份，并发行到天津、上海和朝鲜等地，产生了积极影响。军事特支还和地方特支联合创办了平民夜校、农

